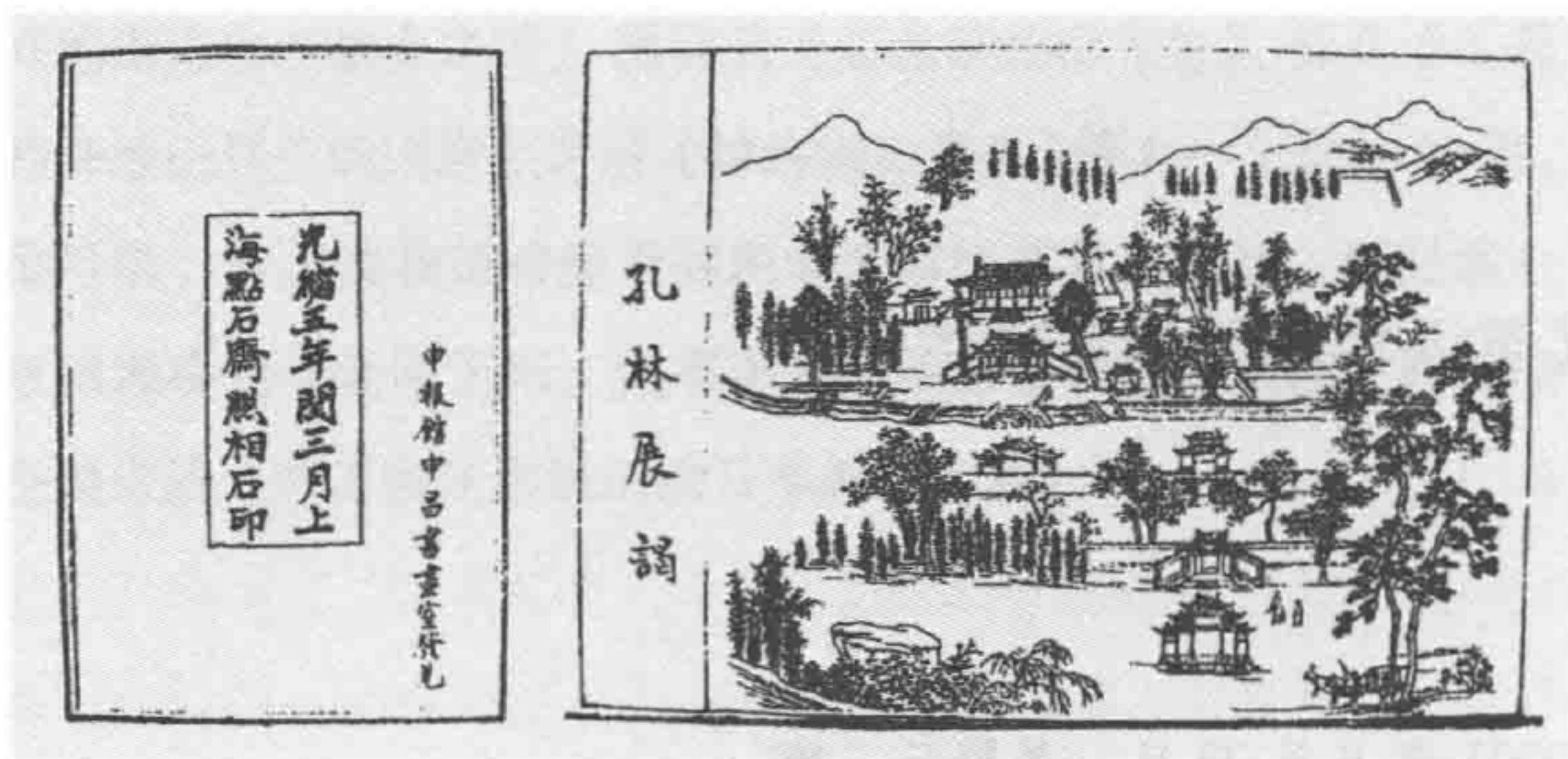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英语集成》与波特兰瓶

2001 年 8 月 22 日，星期三，晴

这回在亚非学院（SOAS）读书，最得意的，是见识了四种晚清的奇书。其中两种出版于上海，石印本；两种刊行于广东，版刻本。光绪五年（1879）闰三月上海点石斋照相石印的《鸿雪因缘》英译选本（*Selections From The Hung—Sueh Sketches*），64 开本，96 页，石印线装。此书半页图像，半页英文，英文上还有印刷体的中文标题，以便与图像上的手写体标题相比照。同是横排的文字，中英“背道而驰”，今人看来，煞是好玩。图像很精美，真像广告上说的，毫厘不爽。而且因缩小比例，比起道光二十九年（1849）扬州刻本，或光绪十年（1884）上海点石斋石印本，英译本的构图显得更为紧凑。只是英文实在不适合于宣纸印刷，封面还说得过去，“导言”部分可就不太清晰了。此书只提原作者麟庆，没说英译者是谁。“导言”的最后一段称：此节译本是由一位中国绅士初译，然后由出版者加以校订的。至于说颂诗无法译，我想



光绪五年（1879）上海点石斋刊《鸿雪因缘》英译本及其中《孔林展謁》图

是托词；估计译者趣味跟我相近，只对诗人的旅程以及汪春泉等人的配图感兴趣，而没有拜读那些诗作的耐心。

1879年7月27日《申报》上刊登署名“点石斋主人美查启”的广告，称“本斋于去年在泰西购得新式石印机器一付，照印各种书画”，可见《鸿雪因缘》英译本乃是其最初刊行的作品。五年后，美查（Ernest Major）创办图文并茂的《点石斋画报》，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在画报的“缘启”中，美查批评传统中国读书人只重文字，不重图像。因此，我怀疑选择图文并茂的《鸿雪因缘图记》作为点石斋的最初产品，与美查的个人趣味有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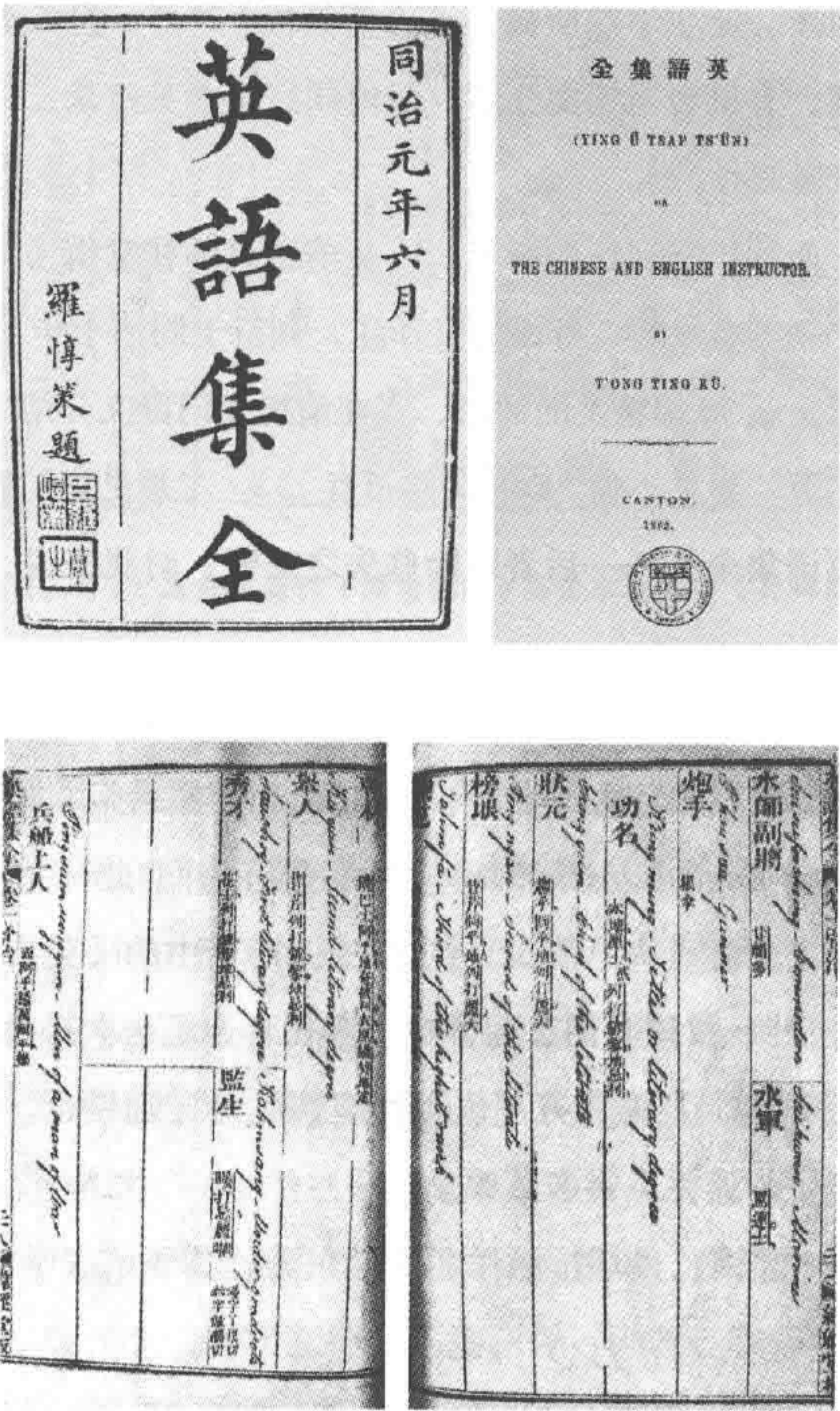
四处搜寻《点石斋画报》，至今未见全套的初刊本，于是只

能东拼西凑。亚非学院所藏《点石斋画报》颇多，且入藏时作过初步整理，有机会当撰文介绍，以飨同好（参见附录三《说不完的〈点石斋画报〉》）。

至于两种广东刊行的奇书，一是羊城惠师礼堂镌《天路历程土话》——五卷线装，粤语方言译注，刊行于同治十年（1871）；更重要的是那30幅精美的插图，实在值得专门撰文介绍（参见附录二《作为“绣像小说”的〈天路历程〉》）。二是见识了唐廷枢编纂的《英语集全》——后者因险些失之交臂，对我来说，更是倍感亲切。

上周五在亚非学院图书馆翻检早期外国人教学中文的课本，无意中找到羊城纬经堂同治元年（1862）刊行的《英语集全》（*The Chinese and English Instructor*），大喜过望。并非此行专家，不过因读过王芝所撰《海客日谭》（1872），对其中的《英吉利语略》印象十分深刻：“阿乃图，写字也。奔司耳，笔也。必巴，纸也。布克，书籍也。乃夫，刀剑也。德哩慈姑蒲，远镜也。哥老克，自鸣钟也。”（参见《海客日谭》4页，台北：广文书局，1970影印本）相比起来，最早接触洋务的广东人，其英语教学应该更强才是。

翻开线装四册的《英语集全》，首先映入眼帘的，是九龙张玉堂所撰序言。张序称留心时务的唐子，如何希望兼及语言与通商，最后撰成“分门别类，订谬指讹，莫不条分缕晰”的《华英



同治元年（1862）羊城緯經堂刊《英語集全》

音释》一书：

我粵自开关，招徕外国商人分部最多，历时亦久，而语言之通，以英国为准。前此非无《英语撮要》等书，但择焉不精，语焉不详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凡有志讲求者，每苦无善本可守。至迟之久，而唐子景星释音书始出。

唐景星？这名字好熟悉，记得是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。马上钻到工具书阅览室，很快找到答案：唐廷枢（1832—1892），广东香山（中山）人，字景星，早年肄业于香港马礼逊教育会堂，1858年任上海海关总翻译，1861年受雇于上海怡和洋行，两年后任总办。1873年被李鸿章委任为轮船招商局总办，1877年主持开采开平煤矿，1885年起专管开平矿务，乃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助手。再翻翻手头这册郭嵩焘《伦敦与巴黎日记》（长沙：岳麓书社，1984），发现其中提及唐氏者竟有13处之多，第972页甚至有“公私事件就景星商办者甚多”的记载，可见此公当年非寻常人物。

得意扬扬地回到自家书桌，突然发现《英语集全》没了。很奇怪，刚才明明摊开放在书桌上，旁边还搁着我的纸笔，怎么会不翼而飞了呢？大概是管理员太热心，以为该书已使用完毕，将其收拾归位。可巡查了半天，不见踪影。周一找，没有；周二找，还是没有。各种可能性都想到了，没上架、归错队、已出借等，

全都一一排除，就是杳无音信。实在忍不住，早上跑去向管理员打听，方才明白是我无意中“发现善本”。那天主管经过，看见我摊在书桌上的书，大感兴趣，当即决定将其收入保存库，以后不再公开借阅。管理员指着那正躺在办公室里休息的《英语集全》，说：真得感谢你，要不是你拿出来，我们还没注意到这书刊行年代这么早。管理员越真诚，我越着急，最后连比带划，说明这书我还没读完，不想就此罢休。好说歹说，总算允许我再看半天。这回学乖了，毫不客气，先复制紧要的若干页，以备将来研究之用。

除序言及发凡起例的《切字论》《读法》，全书共六卷，真的是分门别类，巨细无遗。卷一为天文、地理、时令、帝治、人体、宫室、音乐、武备；卷二为舟楫、马车、器用、工作、服饰、食物、花木；卷三为生物百体、玉石、五金、通商税则、杂货、各色烟、漆器牙器丝货、匹头；卷四为数目、颜色、一字门、尺寸、斤两、茶价、官讼、句语；卷五为人事（一字句至四字句）；卷六为匹头问答、卖茶问答、卖肉问答、卖鸡鸭问答、卖杂货问答、租船问答、早辰问答、早膳、问大餐、小食、大餐、晚餐、雇人问答、晚间嘱咐、买办问答、看银问答、管仓问答、出店问答、探友问答、百病、医药等。据唐廷枢《自题》，之所以每个名词或句子，都包含汉字、英文、罗马注音、汉字注音四部分，目的是“两相通用”：“不但华人可能学英语，即英人美人亦可学华语也。”其中的中文句子以及汉字注音，以广东话为准，因为：

粤东通商，百有余载，中国人与外国交易者，莫如广东最多。是以此书系照广东省城字音较准，以便两相通用。

唐氏自称，幼时到澳门一游，发现“番人楼台庙宇宏壮可观”，决心先学其文字，再追问究竟。后进入洋务场中，常有人前来问字，于是大发感叹：

因睹诸友不通英语，吃亏者有之，受人欺瞒者有之，或因不晓英语受人凌辱者有之，故复将此书较正。自知不足以济世，不过为洋务中人稍为方便耳。

将原先设想的《华英音释》，改定为“包罗万象”的《英语集全》，书名的更改，显示作者的勃勃雄心。不仅仅是语言词典，更希望包含若干洋务知识。正因如此，百余年后的今日，虽则时世推移，国人知识大为长进，此书仍可能因其蕴涵着丰富的商业、文化以及历史语言信息，而为研究者所关注。

下午，着意寻找伍尔夫故居，未果，转往大英博物馆“读书”。

博物馆大街前，一骑警正训斥一开车的小青年，很有意思。那是画有黄色标志的过街道，本应行人优先。两位老太太步履蹒跚，没能尽快通过，开小车的烦了，于是开始“抢跑”。骑警发现，当即勒马上前。眼看着高头大马步步进逼，小车只好缓缓后退。



迈锡尼双耳樽（公元前
1350—前 1325 年）



雅典红色人物瓶（公元前
480—前 470 年）

停稳车子，年轻人下车接受训斥，老太太则从容过街。来伦敦近一个月，这还是头一回在闹市区发现骑警，而且真的管事。

博物馆的大门口聚集了好多游客，不知发生了什么事，进不去。这回学乖了，转往北门，果然畅通无阻。补拍过上次没来得及拍摄的埃及塑像和亚述浮雕，再转过去观看希腊彩陶。

在各文明古国的实用美术里，陶画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。只是由于艺术史家的再三介绍与极力渲染，希腊彩陶显得更加光彩夺目。几乎所有的西方艺术史，都会对希腊陶画的工艺、题材以及风格等，做详细的描述。以至当你踏进展室时，一点都没有生疏或突兀的感觉。不见得熟悉每个陶瓶上所绘的神话传说，也

不见得了解“黑花式”如何向“红花式”转变，但你对陶瓶的制作工艺以及审美特征，大致还是能够把握与欣赏的。

没想到，本来期待值极高的彩陶，竟未给我留下多少好印象。这回的问题，很可能出在博物馆方面带有炫耀意味的陈列方式。大英博物馆这方面的收藏实在太过丰富，安排陈列时，不忍割爱。于是，按不同的年代、形制、尺寸、风格等，排列了无数陶瓶，把整个大厅塞得满满的，只留下行人迂回前进的过道。对于博学的专家来说，这当然是好事，借此可仔细观察并深入分析各陶瓶间的细微差异。可对于缺乏雅兴、也没有足够知识储备的一般观众来说，此种布置近乎“灾难”，因你不知道如何去鉴别与欣赏。巨大而寂静的大厅里，摆放着一排排大同小异的玻璃橱柜，橱柜里排列着无数大同小异的陶瓶，如此展示，焉能引人入胜？妻子开玩笑说，这哪像是博物馆，简直是化学实验室！

倒是罗马时代那个身世离奇但确实很漂亮的波特兰瓶，吸引了很多游客的目光。制作于公元一世纪的波特兰（Portland）瓶，黑底、白像，优雅至极；但其声名远扬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845年那一场故意损坏艺术品的事件。如何将摔成200块碎片的波特兰瓶修复，于是成了文物保护的一大难题。据博物馆方面称，因黏合剂有效期的限制，150年来，此瓶已经三次拆散重装。游客观赏波特兰瓶，既赞叹古人的奇思妙想，又得意今人的巧夺天工。如此地既有“古典”又有“今典”，难怪其博得无数游客的青睐。



波特兰瓶（公元1世纪）

说到底，进博物馆的人中，专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，绝大多数游客其实需要“故事”的牵引。

附记：

说到“故事”，不能不提第二天赴牛津参观阿什莫林（Ashmolean）博物馆的见闻。这座英国最古老的博物馆，建



建于 1683 年的阿什莫林 (Ashmolean) 博物馆

于 1683 年，包括很多牛津大学艺术和考古方面的收藏。中国正式派往西方世界的首任公使郭嵩焘，曾于 1877 年访问牛津大学，顺带参观此博物馆。对此，郭氏日记中有专门的记载。我之刻意寻访此馆，一半是追寻郭君足迹，另一半则是见识那枚北大印章。博物馆收藏的东亚艺术品不少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印章专柜。柜中居然有“乾隆御览之

宝”“雍正御制之宝”等；更奇妙的是，旁边搁一方“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”的象牙章——方形、篆书、阳文，印纽上刻了两只蝙蝠。说明文字称，此章乃埃里克·H. 诺斯（Eric H. North）遗赠。不知此君从何处获得此章，又是怎样转赠博物馆的。据在此地留学的方君称，他曾跟管理员交涉，希望替北大取回此章，还比画着准备揭开专柜的盖子。管理员的回答是：很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我们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，你不能随便拿走；否则，叫警察。